



云南大学100周年校庆纪念文丛



東陸之光

高等教育研究院卷

主编 / 董云川 滕文忠

总主编 / 刘绍怀 何天淳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陆之光. 高等教育研究院卷 / 董云川, 滕文忠主编.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3

(云南大学90周年校庆纪念文丛 / 刘绍怀, 何天淳主编)

ISBN 978-7-5482-1477-9

I. ①东… II. ①董… ②滕…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②自然科学—文集 ③高等教育—文集 IV. ①Z427 ②G6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0255号

责任编辑: 刘 焰

责任校对: 石 可

装帧设计: 刘 雨

电脑制作: 周 旸



云南大学90周年校庆纪念文丛

东陆之光

高等教育研究院卷

主编 \ 董云川 滕文忠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4.875

字 数: 484千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1477-9

定 价: 65.00元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3244 6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目 录

高端论坛

中国大学没有创新土壤

——教育与中国未来三十人论坛 2010 董云川 (3)

返璞归真 提升中国大学教育的微观视角

——教育与中国未来三十人论坛 2011 董云川 (10)

大学教育最大的问题还是政府越位

——教育与中国未来三十人论坛 2012 董云川 (17)

教育创新与创新教育再辩 董云川 (21)

热点冷眼

五官的蒙昧与觉悟：关于社科研究品质的思考 董云川 (29)

多种形态一样化的中国高等教育 董云川 张建新 (35)

高校管理结构的弊端、突破口与路径探讨 张建新 廖鸿志 (46)

关于高等教育前沿问题的思考 张 磊 (56)

从“学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学” 刘徐湘 (70)

大学文化

映射出文化传统的校园景观

——以云南大学为例 张建新 董云川 (79)



大学文化研究反思 张 磊 (89)

云南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研究探索 张建新 董云川 (98)

教育生活体验研究及其理论价值 刘徐湘 陈 健 (110)

从“文化休克”现象看语言习得的“第三种文化” 张建新 (128)

学理考辨

“教”“育”与德行养成 董云川 (139)

“教育就是教育”的现象学阐释 刘徐湘 (144)

通识教育与公民素养的关系再辩 董云川 张琪仁 (152)

大学校长背后的权力关系分析
——从 Rector、Chancellor、President 看校长的权力空间
..... 张 磊 (160)

教育学中具体的人
——现象学的视域 刘徐湘 胡弼成 (176)

本土情怀

本土情怀下的高等教育国际化选择 董云川 张建新 (191)

云南大学本科生学习性投入程度与全国大学院校的对比
..... 吴 玫 Forrest W. Parkay (201)

云南 25 个世居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需求研究咨询报告
..... 张建新 (213)

云南省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分布差异与民族本源性
..... 刘康宁 (223)

2010—2030 年云南省学龄人口变化趋势研究 张建新 (232)

Equal Access of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to Different Typ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 Jianxin Zhang Jef C. Verhoeven (250)

Challenges and Benefits Experienced b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nrolled in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Yunnan
Province, China: Navigating the Intersection of Academic and
National Culture

..... Mei Wu Forrest W. Parkay Paul E. Pitre (274)

质量保障

二八分治：中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制度改良的必然归属

..... 董云川 (293)

“第四代”评估对我国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的启示 刘康宁 (305)

教育评估的边界理性 董云川 (315)

高等教育评估的客观性与非介入性方法 刘康宁 (329)

如何看待高等教育质量及“质量工程” 张 磊 (336)

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指标的聚类分析

..... 刘康宁 董云川 (349)

高教评估中主体的“自我意识”及其意义 刘徐湘 (359)

中国高等教育评估组织多元发展的制度文本分析

..... 刘康宁 董云川 (366)

评估——作为院校亚文化的解析 张建新 刘康宁 (374)

教师发展

从“Ph. D”的价值看高校教师队伍建设 张 磊 (387)

论“教师是社会的代表者”

——兼与吴康宁教授商榷 刘徐湘 (397)

知识人角色与大学教师发展 徐延宇 李 顺 (405)

论教师的自由意志 刘徐湘 (414)

论教师教学中的意志行动：艰难与智慧 刘徐湘 (423)



政策分析

- 云南省 60 年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的研究 张建新 (435)
- 关系、结构与利益表达
- 教育政策执行的网络模式 邓 凡 (445)
- 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过程分析：政策网络的视角 邓 凡 (457)
- 政策网络中教育政策工具的选择 邓 凡 (468)

国际视窗

从二元制到一元制

- 英国高等教育体制变迁的动因研究 张建新 陈学飞 (479)

相同的概念与不同的语义

- 中英高等教育多样性研究项目考察随感 董云川 (499)

新时期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变革与启示

- 刘康宁 李 岩 杨 雪 (506)

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东盟高等教育 张建新 (515)

美国高校教师发展浅析

- 以密歇根大学学习和教学研究中心为个案 徐延宇 (528)

更大的自由和主导权

- 新加坡新“教师成长模式”及其启示 邓 凡 (541)



高端论坛

中国大学没有创新土壤

——教育与未来三十人论坛 2010

董云川*

2010年5月14日，中国思想界、教育界、实业界30位意见领袖聚首中山大学怀士堂，畅谈“教育与未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就教育问题进行跨领域、跨文化的对话。以下是搜狐财经的现场报道。

董云川：我先回应一下刚才几位专家提到的问题，我们在很多地方谈大学理想、大学文化，经常就会有人问，你谈的问题能不能解决？我今天先亮明我的观点——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是两回事。提出问题有时候只需要一个人的智慧就够了，而解决问题常常需要依靠系统的、组织的力量！如果苛求所有提出问题的人都要负责去解决问题的话，那么就很少有人去“多管闲事”了。至于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判断，我完全同意昨天有一位老师提到的观点——中国是高等教育大国而不是高等教育强国。中国高等教育走到今天，在教育规模和教育机会方面所取得的业绩有目共睹，但是它的内在品性怎样呢？这依旧是值得怀疑的，也是

* 董云川，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教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兼任云南省政府督学，云南高等教育评估事务所所长，云南省高等教育学会秘书长，云南省高等教育评估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理事，全国院校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云南蒲公英民族教育扶贫基金会理事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理论、管理韬略、人生智慧。



值得追问的。所以涉及今天这个会议高瞻远瞩的“未来”选题，冯教授跟我预约发言的时候，我一再地推辞，原因就是我觉得再谈这个问题已经有点倦怠了，不是因为不重要，而是因为太重要所以推而不动。后来我申请讲一个形而下的相对具体的问题，冯老师又不同意，于是我还是努力从宏观的角度反省一下中国大学品质不高的根源问题。结果昨天一天听下来，我觉得“上当”了，因为许多大专家还是选择了小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只适合在课堂上面对学生的时候“讲解”较为妥当。在冯老师的敦促下，我试图梳理出制约和削弱中国大学品质的几个绕不开的问题。站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百年的转折点上，前瞻后望，发现如此人口众多的大国，始终未能直接产生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我认为这仅仅是现象之一，更值得反省的问题是泱泱大国，与此相称的哲学家、思想者、文人、诗人们在哪里？还有多少？温家宝总理慈祥而富有责任心地拉着钱老的手，接下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而我的问题是：钱学森之问本来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只有人议论，没有人动作。致使大学品质平庸的游戏规则近些年丝毫未动。经常有人把我们这些谈精神、谈文化、谈问题的学者视为空想主义者，认为应该面对“现实”，随大流运作，大学就将越来越好。这是典型的集体无意识状态！如果大家都按这个渠道走下去，当然高等教育在数量上的贡献还是会有有的，但是必将在“品质”上留下遗憾！禅宗有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骑着马，马跑得很快，旁边的人问他，先生你要到哪儿去？他说我不知道，你问马吧。我以为中国大学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我们高喊改革、我们谋求发展、我们不断解放思想，但是要到哪儿去？我们不知道。

1998年1月，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草坪上写完《找回大学精神》第一稿，当年就与北大一百周年校庆遥相呼应而问世出版，本书2001年第二版，2005年第三版，到2008年刚好十年的时候，又有机会造访哈佛、耶鲁。有学者提醒我说，1998年你在美国西海岸找大学精神，今年从东海岸的哈佛、耶鲁回来是不是应该出一本再找大学精神的书以为对比？我真觉得是个好创意，但最后无果而终！原因是我失语了，没有办法再

深入下去。因为十年前的问题依旧顽固，而且大学不断“背道而驰”，离“文化”“精神”似乎越来越远了！

回到我的命题上来，今天对“品质”问题阐述几个基本的判断。首先还是精神层面的问题。学飞教授昨天引出的话题非常好，要寻找迷失的本性。但遗憾的是，后来跟进的话题似乎偏离了这条线。大学本质上是文化组织，它有政治属性，也有经济属性，这一点没疑问。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都有政治属性，它要为国家服务，要为社会孕育人才；它同时也有经济属性，因为任何一个组织必须有投入、产出和效率的筹划安排。但是请记住，它的本质归属是文化。什么时候中国大学能够成为一个文化组织而不是一个准行政组织或者准经济组织的时候，中国大学才会有杰出表现。温总理语重心长地在“五四”青年座谈会上谈到了解决这个问题两招。一是要让教育家办教育，不是办一阵子，而是办一辈子。我的问题是，是谁让他们办一阵子的？这种制度是谁在安排、谁能够改变？二是要让文科学生读一点自然科学的书，理工科学生读一点人文的书。我以为这是微观技术层面的问题，不是重点。另外，谈到中国大学的问题，我非常欣赏彼得·德鲁克针对亚洲金融危机说了一句话，叫作“亚洲金融危机的问题不是因为电脑用得不够，而是因为人脑用得不够”。这句话相当经典！所以现代化也好、信息化也好，这些“器物”和技术层面的趋势是势不可当的，你学不学、愿不愿意迟早都会卷入这个潮流。问题的根本还在于中国大学什么时候成为一个思想的聚集地，没有思想，操作什么样先进机器的人都可能是蠢材、庸才。所以说制约大学品质的首要问题是本性的问题。

第二就是制度安排的问题。我在2000年的时候撰文，指出中国大学、政府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一条不恰当的直线关系，而不是呈交叉互动的三角关系。大学在这边，社会在那边，而政府居中。凡谈适应，大都远离真正的自主适应，大都是政府教我们怎样去适应。什么专业可以招，什么专业不能招；什么时候扩招，什么时候紧缩；政府手把手教我们“适应”，然后又手把手教我们“创新”，这是很滑稽的事情！大学本来



就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它会自觉改变、调整，并会寻找到适当的生态位存在下去。历史其实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西方大学的发展史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我们偏不这样做。当今无比强大的教育主管部门及其领导们执着地认为，我们不管你们就会失控。于是，大学就被剥夺了自组织能力，丧失了自主成长和自主调节的机制。因此才会在高等教育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出现对于大学办学自主权层出不穷的呼唤。所以在是否适应社会的问题上，并不是大学说了算的。在这一点上大学连菜农的自主性都没法比。一个菜农批发白菜，是因为白菜卖得起价钱，过两天有十个人挑来了同样的白菜，他自己就会转向了，并不需要组织规定他说明天可以放开卖，后天只能紧缩卖，而下个月严控所以不能再卖。不会的，他自己会改变而适应市场的，但大学连拥有这种自主性都变成了奢望。这个专业要控制，那个专业要放开，这种外部指挥内部运行的场景十分可笑。

在一个金字塔体系中，政治、经济、文化是一个立体互动的体系，而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总体上是一个行政主导的体系，大学只是这个庞大行政系统中的一个基层单位，分别被授予副部级、正厅级或者是副厅级待遇。在这个位置上，你就没有理由脱离组织部门、人事部门、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以及诸多与大学运行相关的横向委办厅局的控制。这一点我算是想通了，所以对于所谓的制度变革暂时不存乐观的期望。

刚才的议论其实已经连带回答了第三个问题，就是自组织机制被剥夺。接下来的第四个问题谈到个体角色的混淆。我在哈佛访问的时候有个教授跟我讲，中国的教授和美国的教授最本质的不同，就是美国的教授比较“professional”，他们能够长时间专注于某一领域的研究，而我们却很难做到，并且我们的“全才”较多，不论是谁，到最后都要弄个教授、博导当当！我经常说，什么叫硕导，就是一说就倒；什么叫博导，就是一驳就倒。主要的问题在于全面的角色混乱，比如学术“官僚化”、官僚“学术化”的泛滥，更是导致我们个体角色不能坚守的最根本原因。

第五个制约品质的问题就是关于所谓的“创新”。关于创新缺失的论

断，我认为是绝对存在的。在现行的运行体制之下，平庸是必然，要是没有创新才奇怪。为什么？我1994年写过一篇文章，到现在16年过去了，当时提出：就创新而言，土壤比种子更重要。而创新的关键是什么？我常在讲座时告诉校长们，创新不需要喊口号，创新的本质是求异的，不是求同的，中国大学出现了品质危机、缺少群峰并举的思想家，都与创新土壤贫瘠有关。要谋求创新局面，其实非常简单，容忍不同就行了！无论何时何地，一所大学、一个学科、一个系部、一个组织如若能够容忍不同，这个地方一定成为创新的摇篮，成果必然层出不穷。谢谢！

桑新民：下面是提问时间。

周作宇：大学内部本身也有保守性，如何看待大学的保守性，能否以北大人事改革为例，来破解一下大学内部改革的约束？

董云川：大学本身的保守性在历史上有特定内涵，它曾经或者偶尔也会在历史发展的进程和时代潮流里封闭坚守，显示出孤芳自赏和故步自封。但这不是中国大学的问题。为什么今天我一直在谈机制的问题，因为只要建立起开放的机制，任何的保守性就难以固守。因为保守就会被淘汰，保守就活不下去。近年来，也有人要求大学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但是就像有位专家所说的那样，中国大学从来就没有进入过象牙塔，所以还谈不上走出象牙塔。我的观点亦然，我们现在恰恰需要一点清高，这样可能反而有助于中国大学走向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陈学飞：大学的保守性实质是指大学的学者对学术有批判。北大2004年的人事制度改革，当时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接近西方大学制度的一种安排，是想打破中国大学教师的终身制制度安排，当时应该说绝大多数老师都支持这个改革。但是总体说我觉得是失败的，这是因为政治上的保守性导致的。后来实际上是北大的党委害怕，如果说我们执行这一套改革，当时估计可能会有一批年轻教授要罢教，而北大罢教确实是了不起的，是通天的事情，就很难做，所以党委就主动把这个东西往后退，最后实际上并没有实行。

董云川：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实施受阻的原因是因为没有



改上面。也就是说，那些管教师的人们并没有一个同样优胜劣汰的机制去筛选他们。我有一篇文章写道“教师不是被管理对象，学生不是被教育对象！”整个大学的运行逻辑包括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后勤资源等等，上位组织结构和运行逻辑都没改，只拿老师改来改去是说不通的。

观众提问：今天第一位发言的陈学飞老师说道，我们高校改革总是以适应为主导，从政府的角度是这么要求的。我问的问题是，高校的立场是什么，我们有没有真正地去适应政府的要求，或者我们很愿意真正地去超越，现状好像我们既不适应，也不愿意随潮流，这一点你们怎么看？

董云川：经常听说教育主管部门批评一些学校盲目升格，后来有一位明眼的专家指出：当前中国高等学校竞相升格的行动都不是盲目的，恰恰都是有目的地升格。这种现象就是游戏规则引发的“适应”。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大学很难形成自己的传统，因为需要不断“适应”外部。

信力建：在目前的条件下，中国的高校改革是没有办法完成的，现在都是一股独大，要拆这个梁或者柱子来改革，这个大厦就会倒下来。我觉得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引进外国的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在楼的四面建很多的柱子，把这个楼重新撑起来，才能够把原来的这个大学建筑改掉。当时搞高校合并和扩张，把中国高校再一次彻底毁坏。1952年搞过一个院系调整，是按照苏联的模式调整，那个时候就应该可以开新的大学，原有大学保留，那时候还有机会，但现在一点机会都没有了，这个观点你同意吗？

董云川：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利益格局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大学改革的重大问题不是认识问题，而是既得利益问题。所以多元化教育格局的形成障碍，并不在于非国有的教育力量是否强大，而在于让不让你平等角力的问题。

观众提问：我对董老师关于质量评估的见解很有兴趣，希望你能就此发表一点看法。

董云川：我现在研究评估，也组织评估，自己也被别人评估，也常

常去评估别人，其间常有感慨，现在形成几个基本认识：第一，古今中外所有的好大学、好学科、好学者统统不是评出来的。评估是后生的，不是先有的。第二，规模化的现代教育体系，因为它大了，真的是需要建立一个质量保障框架来制衡、约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评估有存在的价值。第三，完整的教育质量评估行为可以来自组织系统的内部和外部各个方面，也就是说对质量的监督可以来自内部和外部，但是说到底，评估是自己的事情，不是外人的事情。第四，一个大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一定是多样化的，因此大一统的评估体系不管有多好都是不合理的，所以一定要建立多样化的评估体系。简而言之，评估有效，但是作用有限。

返璞归真 提升中国大学教育的微观视角

——教育与未来三十人论坛 2011

董云川*

2011年5月，中国思想界、教育界、实业界30位意见领袖聚首中山大学怀士堂，畅谈“教育与未来”。这是自去年以来，第二次就教育问题进行跨领域、跨文化的对话——回顾：“教育与未来”30人论坛2010年年会。本文是搜狐财经的现场报道。

董云川（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

去年我为了回应“教育与未来”这样一个宏大命题，从相对宏观的角度谈了“精神”“体制”与“机制”等问题。今年我选择相对微观的角度继续发表对于提升中国大学教育品质的看法。

昨天步入会场大门，第一个环节就是请专家留言，我看到香港卢乃桂教授留的墨宝是：中国的希望在教育。我当即闪念，如果非要写不可，我肯定补一句：中国的失望也在教育。刚才福特基金会的何进先生发言，所倡导的务实理念和行为取向本人完全赞同。的确，我们改变不了制度，

* 董云川，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教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兼任云南省政府督学，云南高等教育评估事务所所长，云南省高等教育学会秘书长，云南省高等教育评估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理事，全国院校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云南蒲公英民族教育扶贫基金会理事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理论、管理韬略、人生智慧。

我们改变不了时代，可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但是如若针对形而上的问题、制度层面的问题，做学者的我们不积极建言呼吁，甚至是偶有情绪的表达，社会的健康发展也会有所缺失。因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以及意识、思想的集合总是从不同的偏激中得到综合、加权，继而才能找到相对正确的发展道路。而这种独立思辨的功能作用，只能由知识分子担当。

开幕式上听到李萍教授提及今天庄严的怀士堂曾经是孙中山先生 80 多年前谆谆教诲“我们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地方。我哑然失笑。这难道不是个典型的历史玩笑吗？清华百年庆典给社会留下的印象除了辉煌成就之外，不就是对于梅校长当年“大楼”“大师”之谓演变为“大官之谓也”的幽默改写吗？同样具有黑色幽默寓意的事件层出不穷。最近几天，纷纷扬扬的南科大终于要由组织部门把关为没有级别的朱校长选拔局级副校长了。作为学者，我无言以对。

我在大学工作 28 年了。做过教师、教学管理者、教研人员、教育政策拟定者、教育协会组织者、教育项目研发者、教育质量评估者以及教育中介促进者，较之其他同仁，我对于近年来的教育发展现象可能具有更加复杂而立体的身份角色体验。在所有的角色中，始终没动摇过的想法就是做个独立学者发表真实不虚的言论，即便这些言论并不圆满；最让自己安心的选择就是当个好老师，力所能及地为周围学生的快乐成长做点事情。

令人困惑的是，质量问题在中国教育界其实从未被轻视过，一直以来都是各种改革的焦点。近年来教育改革浪潮此起彼伏，从体制到机制，从内部到外部，从局部试点到整体推进，时而突破难点，时而狠抓关键，时而落实重点，年年都有新招式，处处都在创新篇，大家都在忙“质量”，人人都在论“改革”，在这样的情形下，教育质量忧患日益，何也？就其根本，近年来大多教育改革或所谓创新之举，难免南辕北辙，声东击西，舍本逐末，远大的改革创新理想在自上而下的贯彻过程中、在从宏观到微观的改革路径中逐渐消解，待到进入课堂之时，早已荡然无存了。在浮躁的教育改革形势当中，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到底何在？